

中華佛學學報第 5 期 (p19-30)：(民國 81 年)，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

<http://www.chibs.edu.tw>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No. 05, (1992)

Taipei: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ISSN: 1017-7132

再談「浮屠」與「佛」

季羨林

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名譽會長

p. 19

提要

1947 年，我寫過一篇文章：《浮屠與佛》^[1]，主要是論證中國最古佛典翻譯中的「佛」字，不是直接從梵文 **Buddha**，而是間接通過吐火羅

文 **A**（焉耆文） **pāt** 和 **B**（龜茲文）的 **pud**，**pūd** 譯過來的。一個字的音譯，看來是小事一樁，無關宏旨，實則與佛教傳入中國的途徑和時間有關，決不可等閒視之。文章中有一個問題頗感棘手，這就是，吐火羅文的 **pāt**、**pud** 和 **pūd** 都是清音，而「佛」字的古音則是濁音。由於周燕孫（祖謨）先生的幫助，這個問題算是勉強解決了。從那以後，雖然有時仍然有點耿耿於懷，但是沒有認真再考慮這個問題。

最近幾年讀書時讀到一些與此問題有關的新材料或者對舊材料的新解釋，覺得有必要對那篇文章加以補充和擴大，於是寫了這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分為兩個部分：一、「佛」字對音的來源；二、從「浮屠」與「佛」的關係推測佛教傳入中國的途徑和時間。

一、「佛」字對音的來源

正如我在上面講到的，1947 年那篇文章遺留下來的關鍵問題是清音與獨音的對應問題。原來我忍定了對音的來源是清音。周燕孫先生的解釋也是從這個角度上下手的。但是，時隔四十年，現在看到了一些以前不可能看到的新材料，我們大可以不必這樣去膠柱鼓瑟、刻舟求劍地去解決問題了。「佛」字的對音來源有極大可能就是濁音。

本來在回鶻文中「佛」字就作 **but**，是濁音，這我在那篇篇論文中已經講過。可是我當時認為「佛」字是譯自吐火羅文，對回鶻文沒有多加考慮。這至少是一個疏忽。許多佛教國家的和尚天天必唸的三歸命，在回鶻文中是：

歸命佛 （南無佛） **namo but**

歸命法 （南無法） **namo drm**

歸命僧 （南無僧） **namo sag**

在這裡，梵文 **buddha** 變成了 **but**。回鶻文中還有一個與梵文 **buddha** 相當的字：**bur** 梵文中的 **devātideva**（天中天）在回鶻文中變成了 **tgri tgrisi burxan**^[2]。**burxan** 這個詞兒由兩個詞兒組成，**-bur**，**-xan**。**bur** 就是 **buddha**。這個詞兒相當於吐火羅文 A 的 **ptāñkāt** (**kāṣṣi**) 和 **pättāñkāt** (**dāṣṣi**)，B 的 **pudñäkte** 或 (**kāṣṣi**) **pudñäkte**。

這個 bur 是怎樣來的呢？根據 A.von.Gabain 的意見，它是由 but 演變過來的。她認為，在中國北方的某一個方言中，-t 讀若-r，中國人把 tatar 音譯為“達怛”（古音以-t 收尾），也屬於這個範疇。[3]

H.W. Bailey 對這個問題也發彙了自己的意見。他說：

但是「佛」（Buddha）也用另一種形式從中國傳入中亞。西藏文 ḥbur 表示出八世紀頃漢文「佛」字的讀音，參閱 JRAS.（《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1927 年，頁 296。這個 -r 代表從尾音-t 發展過來的漢文尾音輔音。粟特文複合詞 pwrsknbursang「佛陀僧伽」中有這個詞兒。這個詞兒從粟特文變成了回鶻文 bursang，以同樣的形式傳入蒙古文。回鶻文（在蒙古文中作為外語也一樣）burxan 的第一部份，可能就是這同一個 bur-「佛」（參閱 Mironov，《龜茲研究》，頁 74）。

於是回鶻文 tangri

p. 21

burxan 意思就是「天可汗佛」，但是這個含義不總是被充分認識的，以致摩尼教回鶻文典籍中 burxan zrušč 意思是“Burxan 瑣羅惡斯德”。在另一方屆，日文借用了帶 -t 的字，Butu（Butsu）。[4]

他對 t>r 的解釋同 A.von Gabain 稍有不同。但是，這是從中國傳入口惡的，證據似還不夠充分。

上面我談了回鶻文中梵文 **Buddha** 變為 **but** 然後又由 **but** 變為 **bur** 情況，其間也涉及一些其他中亞新疆的古代語言。我現在專門來談 **buddha** 在一些語言中變化的情況。我先列一個表。

大夏文	buddha 變成 bodo, doddo, boudo
拜火教經典中古波斯文（巴列維文）	buddha 變為 bwt
摩尼教安息文	buddha 變成 bwt/but
摩尼教粟特文	buddha 變成 bwty, pwtty
佛教粟特文	buddha 變成 pwt
達利文	buddha 變成 bot ^[5]

從上列這個表中，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這些文字大別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大夏文，在這裡，原來的梵文元音 **u** 變成了 **o** 或 **ou**，此外則基本上保留了原形。一類是其他屬於伊朗語族的文字，在這裡變化較大。與梵文原字相比，差別很明顯：由原字的兩個音節變為一閉音節，原字的尾元音 **-a**（巴利文是 **-o**，梵文體格單數也是 **-o**）丟掉了。惟一有點問題的是，摩尼教粟特文語尾上有 **-y** 或 **-yy**，可能代表一個半元音。

即使是這樣，也並不影大局，**-y** 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梵文 **-u** 相對應，它可能仍然再存在了。這裡絕大部份都是濁音，只有摩尼教粟特文和佛教粟特文是清音。但是，根據 **H.W.Bailey** 的解釋，這也不是問題，他說：

在粟特文中，印度伊朗語族的濁輔音 **bdg** 在字頭上變成摩擦音 **bgr**，在含有 **bdg** 的外來詞中，它們都需寫成 **ptk**。因此，**pwty** 這個拼法就等於 **But-** 在新波斯文中，**butu** 與這個形式正相當，意思是「偶像」。但是「佛」的含義在新波斯文許多章節中仍很明顯。

p. 22

[6]

這樣一來，清音濁音問題中殘留的那一點點疑惑也掃除淨盡了。

Bailey 還指出來，**Bunbhišn**[7]中有 **but** 這個字，它是企圖用來代表 **Avesta** 中的 **Būiti** 這個字的（**Vībēvbāt**，19，12，43 此章約寫於公元前二世紀中葉），新波斯文證明有 ***Buti** 這樣一個字的，這個字與粟特文的 **pwty** 完全相應。學者們認為，這就是 **buddha** 「佛」。[\[8\]](#)

根據上面的敘述。1947 年論文中貴賢下來的問題全部徹底解決了。再同「佛」與「浮屠」這兩個詞的關係聯繫起來考察，我們可以發現，第一類大夏文中與梵文 **Buddha** 對應的字，有兩個音節，是漢文音譯「浮屠」二字的來源，輔音和元音都毫無問題。第二類其他伊朗語族的文字中，與 **Buddha** 對應的字只有一個音節[\[9\]](#)，是漢文音譯「佛」字的來源。難道這還不夠明確嗎？這個極其簡單的現象卻有極其深刻的意義。下文中再詳細闡述。

我在這裡再談一談吐火羅文的問是。德國學者 **Franz Bernharb** 寫過一篇文章：《犍院羅文與佛教在中亞的傳播》[\[10\]](#)，主要是論證，佛教向中亞和中國傳播時，犍院羅文起了極其重要的橋梁作用。他舉出「彌勒」這一個漢語音譯詞兒來作例子。他認為「彌勒」這個詞兒是通過犍陀羅

文 Metraga 譯為漢文的。他在這裡順便提到「佛」字，並且引用了我的那篇 1947 年的論文：《浮屠與佛》。他說：

沒有提供一個詳盡的論證，我想指出，人們可以看到，漢文「佛」字音譯了一個古吐火羅文 *but-（可以和西吐火羅文” pudñakte ” 串的” pud-” 與東吐火羅文” ptāñkāt” 相比）——由此可見，「佛陀」是一個次的（晚出的）形式。

證之以我在下面的論述，Bernhard 的構擬是完全可以站得位腳的。這也從正面證明了，

p. 23

我對「佛」字來源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11\]](#)

二、從「浮屠」與「佛」的關係推測佛教傳入中國的途徑和時間

關於佛教傳入中國的問題，我在 1947 年的論文中曾作過推測：

中國同佛教最初發生關係，我們雖然不能確定究竟在什麼時候，但一定很早……，而且據我的看法，還是直接的；換句話說，就是還沒有經過西域小國方的媒介，……即便從陸路經過中亞小國而中國，這些小國最初還沒有什麼作用，只最佛教到中國來的過路而已。當時很可能已經有了直接從印度傳語譯過來的經典。《四十二章經》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這一名詞的形成一定就在這個時候。……到了漢末三國時候，西域許多小國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國來傳教，像安士高、支謙、支婁迦讖、安玄、支曜、康巨、康孟祥等是其中最著名的。到了這時候，西域小國對佛教入華才真正有了影響。這些高僧居士譯出的經很多。現在推測起來，他們根據的本子一定不會是梵文原文，而是他們本國的語言。「佛」這一名詞的成立一定就在這時期。[\[12\]](#)

我當年作這些推測的時候，自己心裡把握不太大，覺得頗多浪漫主義。我說的話似乎超過了我當時所掌握的資料。時至今日，新材料大量出

現，再回頭看我這些推測，除了一些地方需要改正外——比如我所說的直接發生關係，現在看來就不妥——，大部份意見是站得住腳的，我頗感自慰。但是，時間畢竟已經過去了四十三年。現在根據新材料做一些補充與修正，看來正是時候了。

總起來看，我在上面一《「佛」字對音的來源》文中得出來的結論：大夏文基本上保留梵文 **Buddha** 的原形，有兩個音節，正與漢譯「浮屠」相當。伊朗語族其他文字，只留下一個音節，正與漢譯「佛」字相當。「浮屠」出現在前，「佛」字在後。這與我的推測是完全相符的。

我現在想進一步來探討這個問題。有這樣一些問題需要回答：大夏語與《四十二章經》是什麼關係？犍陀羅文與《四十二章經》是什麼關係？伊朗語族諸語言與《四十二章經》

p. 24

是什麼關係？看來《四十二章經》是一部關鍵性的書，我在下面就圍繞著這一部書分成以下幾個問題來討論：

- (一)《四十二章經》與大月支
- (二)《四十二章經》原本語言
- (三)支謙等譯經的語言問題
- (四)幾點想法

(一)、《四十二章經》與大月支

《四十二章經》的真偽過去是有爭論的，梁啟超認為是偽，湯用彤認為是真，現在學術界接受的一般是後者的意見。湯先生經過了細緻的考證得到了這樣幾點結論：1.《四十二章經》出世甚早，東漢桓帝以前已經譯出。[\[13\]](#) 2.前後共有兩個譯本。[\[14\]](#)

《四十二章經》與漢明帝永平求法傳說有關。東漢末牟子作《理惑論》，首先敘述了這件事，以後記錄者還很多。[\[15\]](#)據湯先生意見，佛法人華當在永平之前。但是他說：「求法故事，雖有疑問，但歷史上事實常附有可疑傳說，傳說田單妄，然事實不必即須根本推翻」。[\[16\]](#)他的意思是說，永平求法還是可信的成分的，是能夠成立的。

《四十二章經》又與大月友有聯繫。牟子《理惑論》和以後的許多典籍都明確記載著，這一部經是在大月支取得的。《理惑論》說：「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至於此經究竟是在何地譯出，許多典籍記載中有明顯矛盾意見：一主張在大月支譯出，一主張在國內翻譯。看來在大月支譯出說，根據似確鑿可靠。[\[17\]](#)

大月友號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呢？它是遊牧民族，行蹤飄忽不定，《前漢書》九六上《西域傳》說：

（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至簡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陸大夏而臣之。

p. 25

這件事情發生的時間，約在西漢文帝至武帝時。

這樣一來，《四十二章經》又與大夏發生了關係。因為，「于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時，大月支已經到了大夏。大夏君主原屬希臘遺民，佛法大概在漢初已在這裡流行。漢武帝時，張騫曾奉使到這裡來過。《三國志》裴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說：

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並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日肩頭邪，母日莫邪。……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B. C. 2），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18\]](#)

這一段話說明了大月氏與大夏的關係，大月氏與印度的關係，大月氏與佛教的關係。至於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號浮屠經》，是在大月氏呢？是在中國？有兩種可能，有兩種意見。不管怎樣，大月氏在公元前已流行佛教，這比《四十二章經》又要早了。

我在這裡附帶談一個問題。《理惑論》說，明帝派人到大月氏寫《四十二章經》，其中竟有張騫。這在時間上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我認為，其中透露了一個耐人尋味的信息：這時大月氏是在大夏，因為張騫奉使大夏的故事，當時街談巷論中必廣泛流傳，一想到大夏，就想到張騫了。

(二)、《四十二章經》原本語言

把與《四十二章經》有關的問題都交代清楚以後，現在應該探討此經的語言問題了。在 1947 年的論文中，我說它是從中亞一種俗語譯過來的，這種想法是對頭的。但是，我當時不可能說出一種具體的語言。

最近梅村提出了一個新見解：《四十二章經》是從犍陀羅文《法句經》譯過來的。他正在撰寫論文，他的詳細論點我毫無所知。但是，我覺得，在中國佛教史上，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值得探討。它還牽涉到《四十二章經》原本語言究竟是什麼，我就在這裡先談一談我對於這個問題的一些想法，供林梅村先生以及其他學者參考。愚意認為或者尚有些許可取之處吧。

從表面上看起來，《四十二章經》與《法句經》不完全一樣。但是從內容上來看，則二者實有許多相通之處。三時失名之《法句經》說：「是後五部沙門，各自鈔探經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義，條別爲品，於十二部經靡不斟酌，無所適名，故曰《法句》。」《法句經》是這樣，《四十二章經》也是這樣。所謂《四十二章經》，原來並沒有「經」字，足徵它不是一部完整的「經」。所以。湯用彤先生說“《四十二章經》乃撮取群經而成，

p. 26

其中各章，頗有見於巴利文各經，及中國典者，但常較爲簡略耳。」[\[19\]](#)兩經的性質既然完全相同，即使表面上有差異。《四十二章經》譯自《法句經》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是否就是從現存的犍陀羅文《法句經》譯的呢？還是一個有待於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根據林梅村最近的研究結果：

這就從語言學上證明，這部犍陀羅語《法句經》確實出於于闐故地，抄寫者無疑是位于闐人，因而把自己的土著語言摻入其中。[\[20\]](#)

可是，我在上面已經明確無誤地說明了《四十二章經》是在大月支，也就是大夏抄譯的。現存的犍陀羅文《法句經》既然抄在于闐，因而它就不可能是《四十二章經》的來源。道理是非常明顯的。

在大夏的那一本《法句經》或《四十二章經》是什麼樣子呢？說實話，我自己並不很清楚。我現在只能作一些猜測。大月支到了大夏以後，由於環境關係，接受了佛教。估計會有一些佛經翻譯。《法句經》或《四十二章經》等，包含著小乘教義的最基本的內容，簡直像一種「佛學入門」，對皈依者用處極大。可能首先在翻譯之列，用的語言當然是大夏文。對於這種語言，我們過毫無所知。近年以來，新材料發現越來越多，是逐漸發現，認識了不少的詞彙。上面注か舉的那一部字典就是詞彙的匯集，**bodo**，**boddo**，**boudo** 等字就見於其中。但是成本的佛經譯文還沒有發現。我相信，有朝一日，總會發現的。中國使者到了大夏，翻譯《四十二章經》，原本一定就是這一本大夏文的佛經。譯文就是本經兩個譯本的第一個。我推測，現存本經中的那許多「佛言」，一定會是「浮屠言」，「浮屠」正與 **bodo**，**boddo**，**boudo** 相當。用「佛言」的現存的本子一定就是第二個譯本。這個本子的原始語言是中亞或新疆的某一種語言，其中梵文 **Buddha** 變為 **but** 或者類似的形式，漢譯是「佛」字。

我在這裡想補充幾句，談一談犍陀羅文《法句經》的來源問題。它的來源並不排除是大夏文本，但是可能性微乎其微。梵文本的《法句經》曾在新疆發現，足徵《法句經》在新疆是流行的。這個犍陀羅文的《法句經》同梵文本有某種聯繫，是完全可能的。犍陀羅文不可能是《四十二章經》第二個譯本的母本。因為在後者中用的是「佛」字，而在犍陀羅文本中則是 **budhu**，這個字可以譯為「浮屠」。

p. 27

(三)、支謙等譯經的語言問題

《四十二章經》的語言既已確定，連帶提出來是支謙、安世高等後漢、三國時期的譯經大師的譯經語言問題。對於這個問題過去幾乎完全沒有注意到。實則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不討論是不行的。

我現在就以梁《高僧傳》第一卷為基礎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在這一卷中後漢、三國時期的譯經大師幾乎包羅無遺。至於攝摩騰和竺法蘭等人物，神話色彩頗濃，我在這裡不談。

先將資條列如下：

《安清（世高）傳》：

至止未久，即通歸華言。於是宣譯眾經，改胡為漢。[\[21\]](#)

姜林案：「胡」字，元明刻經改為「梵」字，下同。

《支婁迦讖（支讖）傳》：

漢靈帝時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

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以漢靈之時，齋《道行經》來適雒陽，即轉梵為漢。

安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

先是沙門曇果于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為漢文。[\[22\]](#)

《康僧會傳》附《支謙傳》：

遍學異書，通六國語。……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眾本，譯為漢語。[\[23\]](#)

《維祇難傳》：

以吳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齋《曇鉢經》梵本。[\[24\]](#)

p. 28

《竺曇摩羅刹傳》：

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遂大齋梵經，還歸中夏。[\[25\]](#)

附《聶承遠傳》：

承遠有子道真，亦善梵學。[26]

《僧伽跋澄傳》：

（趙正）請譯梵文。……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為梵文。[27]

《僧伽提婆傳》：

提婆乃於般若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罽賓沙門僧伽羅放執梵本，提婆翻為晉言。[28]

《竺佛念傳》：

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為晉。[29]

《曇摩耶舍傳》：

以偽秦弘始九年，初書梵書文。……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30]

《高僧傳》卷一中有關梵文的記載就是這樣。「梵」原作「胡」。「梵」指的是梵文，這是清楚的。但「胡」指的是什麼呢？並不清楚。「胡」原意是北狄之通稱，擴大一點，

p. 29

就是夷狄之人，多少含有貶義。在《高僧傳》中，「胡」字可能有兩層意思：一指梵文，一指中亞夷狄之文。統觀上引材料，有的可能是指梵文，比如曇果、維祇難等傳中所說。但是絕大部份指的都是中亞民族語言。支謙等人譯經的原本都不是梵文。上引文中《支謙傳》的「梵文」，也只能作如是解。下面說他「妙善方言」，可能指他通中亞民族語言。這一點從他們譯經時使用的漢語音譯中叮以明確無誤地看出來。比如漢譯「彌勒」一詞，不是來自梵文 **Maitreya**，而是來自吐火羅文 **Metrak**。

可是康僧會譯《六度集經》、《舊雜譬喻經》、失譯人名在後漢錄譯《大方便佛報恩經》，康孟詳譯《佛說興起行經》，支婁迦識譯《雜譬喻經》、《道行般若經》等等，用的都是「彌勒」。由此可見，支謙等譯經所根據的原本，不是梵文，而是中亞和新疆一帶的吐火羅文和伊朗語族的語言。

(四)、幾點想法

現在把上面討論的問題歸納一下，提出幾點想法。

1. 1947 年恣章中提出的佛教「直接」傳入中國論，現在看來，不能成立了。我設想的佛教傳入兩階段說仍然維持。我用公式來表達：

(1) 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國

buddha→bodo, boddo, boudo→浮屠

(2) 印度→中亞疆小國→中國

buddha→but→佛

這兩個階段都不是「直接的」。

2. 我這篇不算太長的論文解決了中國佛教史上兩個大問題：佛教是什麼時候傳入中國的？通過什麼渠道？但茲事體大，還要進一步研究。這有待於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31\]](#)

附記：在寫作過程中，提供資料、幫助借書，我的兩位小友榮新江錢文忠出了力，附此致謝。

1989.11.2 寫畢

p. 30

Second Talk on "Fu Tu" and "Fo"

Ji Xian-l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of China

Summary

Second Talk on "Fu Tu" and "Fo" Ji Xian-lin Summary In 1947, I wrote an article on "Fu Tu and Fo" to examine and ascertain that "Fo" in Chinese oldest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exts was translated not directly from the Sanskrit word "Buddha" but indirectly through the " pät " in Tukhāra and the "pud" and " pūd " in Kuchean. The transliteration of one word seems to

be trivial, yet it h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ath and tim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China. Therefore, it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lightly. In that article there is one problem very hard to tackle with, i.e. "pät", "pud" and "pūd" are all clear sounds while the ancient sound of "Fo" in Mandarin is voiced sound. Thanks to Mr. Chou Yen-sun's assistance, this problem has been solved temporarily. Since then, although I still feel a little unsatisfied, I never consider this problem seriously.

In recent years, I have encountered some new materials about this problem or new interpretations of the old materials, I feel it necessary to supplement and enlarge that old article. Accordingly, this present paper is written. It consists of two parts: (1) The source of the counter-sound of "Fo", and (2) The deduction of the path and tim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China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 Tu" and "Fo" in Chinese language.>

[1] 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本院成立第二十周年專號》，上冊，頁 93-105，1948 年。英譯文見印度

Sino-Indian Studies，III.1，2，Calcutta 1947，p.1ff。後收入《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頁 323-336 英譯文收入《印度古代語言論集》，頁 334-347: On the oldest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of the Name of Buddha

[2] A.von Gabain, *Buddhistische Türkenmission*，見

Asiatica, Festschrift Friedrich Weller,

1954 Otto Harrassowitz, Leipzig, p.171.

[3] 同上書，頁。

[4] *Opera Minora*，*Articles on Iranian Studies*，ed. by M. Nawabi，

Shiraz Iran，1981.

[5] G. Djelani Davary, *Baktrisch, ein Wörterbuch auf Grund der Inschriften, Handschriften, Münzen und Siegelsteine*, Heidelberg 1982.

[6] *Opera Minora* , 頁 103 。

[7] 上引書，頁同。

[8] 上引書，頁 106-107 。

[9] Bailey 在上引書，頁 107 注 2 中指出，*Avesta Būiti* 最後的-i 可能來源於東伊朗語言。這個-i 就是上面講到的半元音-y 。

[10] *Gāndhārī and the Buddhist Mission in Central Asia*, Añjali, *Papers on Indology and Buddhism*, O.H. de A. Wijesekera Felicitation Volume , ed. by J. Tilakasiri, Peradeniya, 1970, p.55--62

[11] 「佛」字有沒有可能來源於伊朗語族的某一種語言？我認爲，這個可能是存在的。這有待於深入的探討。我在這裡還想補充幾句。在同屬於伊朗語族的于闐塞文中的，「佛」字是 **balya** ，顯然與同族的其他文字不同。

見 H.W.Bailey,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2] 《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 頁 333--334 。

[13]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1938 年，商務印書館，上，頁 32-33 。

[14] 同上書、卷、頁 36-38。湯先生非常慎重，他寫道：「以上推論，似涉武斷。但合漢晉所引本經考之，則有二古本，實無可疑。」

[15] 參閱同上書、卷、頁 16 。

[16] 同上書、卷、頁 24。

[17] 湯用彤先生主此說。參閱同上書、卷、頁 31：「牟子所傳，雖有疑義，但決非全誣。若據其所言，斯經譯於月氏，送至中夏也。」

[18] 關於這一段話人名和地名等問題的考證，參閱湯用彤，同上書、卷、頁 50--51。

[19] 上引書，頁 41。

[20] 《犍陀羅語〈法句經〉殘卷初步研究》，頁 257，見《出土文獻研究》第二輯。

[21] 《大正新修大藏經》50・323b。

[22] 同上書、卷、324b--c。

[23] 同上書、卷、325a。參閱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大正藏》49・58c。

[24] 《大正藏》50・326b。

[25] 同上書、卷、326c。以上諸人晚於三國。

[26] 同上書、卷、327a。

[27] 同上書、卷、328b。下面還有兩處提到梵文。

[28] 同上書、卷、329a。

[29] 同上書、卷、329b。

[30] 同上書、卷、329c。

[31] J.Fussman, language and Culture among the kushans,

見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Cultures of Central Asi

a 的 Information Bulletin Issue 15, Moscom, 1989, 頁 57--66, 其中談到大

夏語, 可以參閱。